



上合之心

王林强



随着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临近，激情日夜在我心中无声奔涌。参与这场盛会的筹备，生命从未如此丰盈。这丰盈，是溪流汇入浩瀚江海激起的壮阔波澜，是脉搏与时代洪钟共振的磅礴回响。峰会启幕在即，无数颗因盛会而激荡的心，如五道凝聚不同维度深情与伟力的光环，相互熔铸成辉映津沽大地、联通五洲四海的磅礴“上合之心”——以血脉与心魂紧紧相连，成为贯穿这一宏大叙事最深沉、最滚烫的灵魂纽带。

初心的归航

八月的风，穿行在津南的稻浪间，将深沉的期盼，悄然融入小站镇会馆村53亩翻涌的绿涛中。大地以最蓬勃的生命力，铺展出“上合回家相约天津”的温暖邀约。

2001年浦江之畔，六国元首播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种子。廿四载春秋流转，这颗种子在广袤的欧亚大陆生根发芽，硕果盈枝：以互信为基，成员国并肩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撑起区域和平的朗朗晴空；以互利为桥，经贸合作根深叶茂，贸易往来如江河奔涌；以平等协商为舟，在求同存异中校准航向，让多样文明在此璀璨交融。谱写了超越地域与文明差异的和谐乐章。

廿四载后的今天，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又一次回归这片孕育“上海精神”的东方沃土，渤海之滨的天津盛装以待。作为服务峰会的一员，我见证了这座城市的默默耕耘：从春日的“精细妆点”，到盛夏的全情投入，所有汗水浇灌的希望、匠心雕琢的细节，只为在金秋之际，以最饱满的姿态，迎接“上合”回家。

归航，是为了汲取深植沃土的力量，更好地扬帆远航。本人有幸参与上合组织峰会新闻中心的建设运行，融入其间、服务其中，以笔为犁，以心为壤，与津门儿女共同感受期盼的温度，憧憬时代的乐章；上合组织必将在这片希望升腾的沃土上，续写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壮丽的华章。

同心的潮流

办好一个会，搞活一座城。上合组织峰会于天津而言，宛如海河奔流向海的蓄力。当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这颗兼容并蓄、开放美丽的渤海明珠，蕴藏于市井烟火、街巷肌理中的磅礴力量，化作浩荡浪潮同心向前，托举着天津奔向更壮阔的蓝海。

在峰会新闻中心非遗展区，展示杨柳青年木版年画的老艺人李师傅反复雕琢《连年有余》的刻版。媒体餐厅里，煎饼制作台上热气升腾，刘大姐将津门烟火里的味道包裹在这一套“讲究”里，传递着这座城市热情的待客之道与质朴的人文关怀。

决心的砥柱

峰会筹备期间的日日夜夜，我与各条战线的同事们亲见这场宏大叙事的基石如何浇筑而成。

晨露未晞，坚守在绿化岗位上的蒋工半蹲在迎客松前，指尖捻着些许土壤轻嗅：“根要扎牢、叶要养亮，精气神足了，才配得上迎接五湖四海的宾朋！”从土壤配比到枝叶修剪，“视草木如珍宝”的执念贯穿养护的全过程。那深嵌于浓郁绿意中的脉动，恰是这座城市坚韧风骨与好客胸怀的宣言。

面对场馆提升的技术要求，工程师团队反复验算：“0.1毫米的误差就是十倍的隐患”“万分之一不确定都要杜绝”——这些话语成为团队的信条。图纸上每处修改都镌刻着对安全极致的苛求。每个推门而入的时刻，看见伏案演算的背影，听到图纸翻动的声音，便会被那份专注与执着深深打动。

服务团队将“细节决定成败”的理念融入演练场：镜前数千次打磨的微笑弧度如呼吸般自然，定格指引的手势如路标般精准——汗水浸透制服的背后，是责任的躬身践行；毫厘间的专注，是完美的无声承诺。

每一次目睹这些默默顶起千钧的脊梁，每一次注视他们眼中不熄的信念星火，便愈加深切地体会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创造”的精神。

信心的灯塔

入夜，上合组织峰会新闻中心内灯火通明，记者们在此忙碌而有序地工作着。这里是峰会声音传向世界的枢纽，是展示中国气派、天津韵味的窗口，也是2800多位中外记者的“家”。

作为这个“家”的装扮者，筹备过程中的一幕幕场景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

时间紧、任务重，多家单位协同作战，多个界面交叉推进。关键时刻，经上级党委批准，临时党支部正式成立，以“六心工程”为引

领，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专业服务效能，筑起一座高效运转的信心堡垒，如灯塔般凝聚信心。

“红心堡垒”推动支部会、调度会、现场会三会融合，让难题迎刃而解；“匠心团队”的三支党员突击队坚持问题不过夜，实现施工零隐患；工程师团队验算调试千锤百炼，将误差严控在毫米之内，铸就“安心工程”；现场组悉心营造“舒心家园”，为记者们提供周到服务；“暖心工地”的深夜食堂保障联勤战友，清凉驿站全天供应防暑物资，共建服务峰会的“同心平台”……“六心”如一，成为跨部门协作的“黏合剂”，让信任与协作成为可能。

现场组的老李，如同精准的铆钉，将匠心与安心“钉”进每个角落，用“零误差”的专业精神守护使命；场馆保障组的小陈高烧刚退就返回岗位……还有许多未被镜头捕捉到的身影，在这座信心灯塔的照耀下，书写着平凡而坚韧的奉献故事。

赤心的暖阳

为了上合组织峰会的周全安全、精彩圆满，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各就各位、各尽其责、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凝聚起支持盛会的合力，展现了天津崭新的精神海拔。

回想进入筹备组那天，滨海海风习习，我的血脉中奔涌着难以抑制的激情。往返场馆的交通工具上，或挤于晨光熹微的首班地铁，或独对灯火阑珊的末班车厢，窗外风景流转，如同岁月胶片一张张掠过，让日常的藤蔓悄然缠绕，生长出超越热血叙事的生命年轮。

每一次方案推演，每一处现场踏勘，每一份文书斟酌，每一个伏案深夜，“峰会有我！使命必达！”的信念便如熔岩一般奔涌升腾。这份赤诚，熔铸于每一次严谨高效的沟通中，凝结于每一封千锤百炼的细节里。

北方夏日午后，柏油路烫得能煎熟鸡蛋。检查新铺就的地面时，我时常趴在地上用水平仪校量。掌心按在滚烫的地面上，看着那道笔直的接缝线，忽忆起父亲铺院子里的石板路，也是这样一寸寸找平，说“路得平，走在上面才稳”。傍晚，从场馆出来，远在老家的母亲打来视频电话：“电视里说，天津海河的夜景特别美。”我凝望满城渐次点亮的灯光，忽然觉得掌心的茧子都在发烫。

工作手册上的待办事项一个个被划掉，桌角倒计时牌上的数字，轻盈而坚定地飞向期盼已久的“零”。此刻，渤海之滨，海河之津，由无数期待、汗水、智慧与信念共同熔铸的“上合之心”——初心的归航、同心的潮流、决心的砥柱、信心的灯塔、赤心的暖阳这五道饱含深情与力量的光环紧紧相连、环环相扣，以最强劲、最自信的搏动，激荡出时代洪流奔涌向前的澎湃巨响！

漕运印记：
杨柳青年画的诞生与传承

高原

九河下梢的天津在明清两代依托庞大的漕运网络，成为沟通南北的经济命脉与文化走廊。繁忙的河道不仅运送着粮食货物，也悄然承载着技艺与审美的交流。明永乐年间，随着江南移民的北迁，雕版印刷技术也随之传入，并与北方老百姓长久以来的信仰、生活习惯和审美方式结合在一起，互相吸收融合。最终，在天津卫西边的杨柳青镇，杨柳青年画依托繁忙的水陆码头和运河两岸的生活，逐渐孕育成熟。

漕运带来的不只是技术，更是文化与市场的需求。作为重要的漕运节点，天津会聚了南来北往的人群，形成了繁华的市井文化。年节将至，驱邪纳福、装饰居所的需求在码头工人、商人、市民中尤为旺盛。正是这种因漕运而勃兴的市民社会，为杨柳青年画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土壤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历经岁月的沉淀，杨柳青年画从萌芽走向成熟，至清乾隆时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在杨柳青镇上，几乎家家户户会点染作画。画坊林立，逾百家作坊日夜不息，年产量达到千万幅之巨。这些颜色鲜艳、充满吉祥图案的年画，和运河南来北往的货船一样，被运到四面八方，远销至华北、东北，将杨柳青年画的艺术与祝福送入千家万户。

杨柳青年画的艺术魅力源于其独特而严谨的制作工艺。完成一幅年画，必须完整经历“勾、刻、印、绘、裱”五道核心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首先是“勾”，由经验丰富的画师构思布局，用墨线勾勒出精细的画稿。接着是“刻”，由技

艺精湛的刻版师傅根据墨稿，在木质坚实细密的梨木或杜梨木上仔细雕刻出线条版。然后是“印”，其步骤是将刻好的线条版固定，上墨后印在纸上，得到清晰的画作轮廓。最为关键的是“绘”，这是杨柳青年画区别于其他年画的独特之处——“半印半绘”，即在印好的轮廓上由画师手工填色上彩。这不是简单的涂色，而是要求画师根据不同题材、人物和场景，灵活运用晕染、烘托、点簇等技法进行艺术再加工，精心绘出色彩的层次、明暗和生动效果。最后进行“裱”工，将完成的作品托裱加固，使其平整美观，易于张贴保存。这其中，“半印半绘”技法堪称杨柳青年画的灵魂，它巧妙结合了雕版印刷能快速、精准复制轮廓的效率优势与手绘能呈现丰富色彩、精妙艺术表现力的长处。而这要求工匠必须具备高超的绘画技艺和深厚的美学素养。因此，一名合格的杨柳青年画画家，通常需要跟随师傅持续学习并刻苦实践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

杨柳青年画的题材极其丰富，承载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和精神寄托。清代杨柳青年画题材大致可分为四大类：门神类：如秦琼、尉迟恭等威武形象，寄托驱邪避凶、守卫家宅的愿望；娃娃类：以健康活泼、憨态可掬的童子为主角，如著名的《连年有余》《五子夺魁》，象征多子多福、吉祥富贵；戏曲类：描绘戏曲舞台上的经典场景和人物，满足民众对戏剧艺术的热爱，传播忠孝节义等传统价值观；民俗类：描绘市井生活、节庆风俗、神话传说等，反映社会百态，充满生活情趣。

杨柳青年画的功能远不止于节庆装饰，它还承担着社会教化的重要职责。那些描绘历史故事、忠臣孝子（如《二

十四孝图》）、英雄传奇的作品，通过直观生动的画面，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大众，实现了“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其影响甚至深入宫廷，《二十四孝图》等年画被用于装饰长春宫，正是杨柳青年画“雅俗共赏”文化特质的典型体现。

当运河的热闹景象渐渐消失在历史中，杨柳青年画却用独特的艺术形式，记录下九河下梢地区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的文化根源。2006年，杨柳青年画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见证了这种从运河沿岸普通百姓的生活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艺术的顽强生命力。展开一幅《连年有余》，仔细观察画面里由“勾、刻、印、绘、裱”这五道关键工序完成的线条：“勾”这一步，是江南雕版技艺和北方民俗风格的初次交融；“刻”的深浅，记录着承载了千年漕运故事的杜梨木板上的纹路；“印”与“绘”这两种工艺的结合，形成了带有部分机械效率但核心仍依靠手工灵性的独特方式；“裱”作为最后一步，完成整幅年画的制作。这些色彩鲜艳的年画，早已不仅仅是过年的装饰品，它们生动地展现了民间习俗：门神画里秦琼身上的盔甲，反映了明清时期老百姓希望家中平安的愿望；《二十四孝图》的画面，展现了儒家道德规范如何在普通大众生活中传播开来；而画中热闹的市集和戏台场景，则定格了运河边生机勃勃的民间生活。年画《四艺雅聚》被用于皇宫装饰的事实证明，这门最初诞生于漕运码头边的民间艺术，最终成为连接社会各阶层的文化桥梁，其艺术价值得到广泛认可。

今天，在博物馆里看杨柳青年画，我们看到的是天津这座因水而兴的城市的历史：从帆船林立的码头到机器轰鸣的商埠，杜梨木上的每一刀刻痕，都像城市的视觉档案。运河或许变迁，年俗或许变化，但杨柳青年画已将九河下梢的水文化融入骨骼，转化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

在山路上策马奔驰，手握双枪左右射击，冲过敌人的封锁……这是电影《平原游击队》的第一个镜头，李向阳的伟岸身姿深深印刻在一代人的脑海中。电影百看不厌，英雄人人争说，李向阳这个响亮上口的名字，一度成为英雄的代号。

小时候唱过这样一首儿歌：“学习李向阳，坚决不投降，敌人来抓我，我就跳高墙；高墙不顶用，我就钻地洞，地洞有枪子，打死小日本。”这是游戏的儿歌，用在跳皮筋时，因为跳皮筋要跳上跳下，所以，“跳高墙”就是翻越皮筋，而“钻地洞”就是从皮筋底下钻过去。这个歌谣还有略微差不多的其他几个版本，但歌词内容大体相似。

民间儿歌不会凭空出现，也自然会有来头。这首儿歌的内容和电影《平原游击队》的剧情有关。该片剧情大致是这样：1943年秋天，身为游击队队长的李向阳受命于军区司令，从山下来，李向阳下山，是要深入敌后平原地区的一个县城，牵制进行大扫荡的日寇松井中队，阻止其增援，减轻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力，同时还要保住存在县城附近李庄的公粮。李向阳策马奔驰的那个镜头，展现的就是他前去领命，此后李向阳与参谋长兵分两路，他率队前往家乡李庄转移粮食，而汉奸李老宗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向松井告密，松井带队包围李庄，情势十分危急。电影情节就是在这样的情境里深入的，李向阳的队伍被围，而他临危不惧，虽然是“敌人围困万千重”，但他却“我自岿然不动”。李向阳就此与敌展开游击战，以坚忍不拔的意志与敌周旋。因此，儿歌所唱的“学习李向阳，坚决不投降”确有所指，而李向阳采用的战术主要是地道战，所以说儿歌中所唱的“跳高墙”和“钻地洞”，也都是地道战的表现。

《平原游击队》是一部真实表现八路军游击队利用地道战的方式与敌激战的电影，比1965年上映的《地道战》要早十年。在拍摄这部电影前，摄制组曾到河北省清苑县（现保定市清苑区）的冉庄体验生活。当时，那些曾经历过地道战的人与地道俱在，有利于主创获得第一手的生活资料，这相当重要。“跳高墙”和“钻地洞”，体现了冀中人民在抗战中全民皆兵的智慧与勇气，村庄农舍里的锅台、柴堆、墙壁、水井等生活设施都成为地道的洞口和掩体。地道战“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户户相连，村村相接”，使得冀中平原成为地下长城。地道战是李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抗战文艺回眸

杨仲达



向阳采用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发挥游击战精髓的手段，但还不止如此。李向阳的游击队和松井中队对斗智斗勇，互相侦察与反侦察，追击作战在地下、村里村外、城内城外这三个维度之间展开。李向阳火烧炮楼调虎离山，在敌人并未中计之后再出良策，他又三入县城，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炸毁日军弹药列车，烧毁日军粮库，又再度诱敌深入，在李庄解救出被捕的乡亲，击毙了松井，松井中队全军覆没。李向阳有勇有谋，每每深入虎穴而毫不畏惧，尤其在关键时刻亮出“我是李向阳”的旗号，即可威震敌胆。这种英雄主义潜移默化，于是我所熟悉的那首儿歌应运而生。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其实李向阳并不是从天而降，他的这场抗日战斗是在其家乡展开，他的母亲也参与其中，他真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电影《平原游击队》在1974年改编成现代京剧影片《平原作战》，其中有一句经典唱词：“霹雳一声春雷响，平原上谁不晓农的儿子赵勇刚。”

赵勇刚就是李向阳的化身。

电影《平原游击队》脱胎于邢野创作的三幕七场话剧《游击队队长》。邢野是天津人，天津沦陷之后投身抗战，因受天津话剧之风影响而酷爱文艺创作，一直在文艺部门工作，先后任职于抗敌演剧队、陕北公学剧团、华北联大文工团、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冲锋剧团、冀晋军区文工团等文艺社团。1952年，邢野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工作时创作了这部话剧，因所长丁玲兼任《人民文学》主编，于是他把剧本交给丁玲希望发表，但丁玲认为《人民文学》不宜发表话剧剧本。1953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游击队队长》单行本。同年，丁玲请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把邢野调入电影局，让他把话剧《游击队队长》改编成电影，合作作者是剧作家羽山，取名《平原游击队》。电影上映之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值得一说的是，主人公李向阳的扮演者郭振清也是天津人。

题图为电影《平原游击队》剧照。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当初清宫大内珍藏的法书名画有相当一部分竟来自天津的大收藏家安麓村的沽水草堂。

安麓村名岐，字仪周，别号松泉老人，生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本为朝鲜族人，后入旗籍，祖籍奉天。曾在扬州业盐，家业巨富。康熙四十七年（1708）定居天津，在城东南六里建沽水草堂。他的忘年之友查礼在《画梅题记》中说，安麓村的沽水草堂“贮牙签万轴，余尽商周秦汉青绿宝器，唐宋元明名家之翰墨也”。麓村“寢食其间，俗夫不得窥户牖”，时人将沽水草堂比作元代大家的清閟阁和明代大收藏家的天籁阁。《天津县志新卷》卷二十五对沽水草堂有此描述：“中绕水竹，台榭之胜，别构邃室，藏金石书画甚富，人比之天籁阁。”天籁阁的主人即明嘉靖年间著名收藏鉴赏家项子京，其书画收藏富比天下。

沽水草堂是如何得到这么多珍宝的？史料记载，安麓村虽丰履厚，然淡泊明志，“学问宏通，极精鉴赏”，为盐务事常往来于淮南、津沽两地，遇书画商求售者，盖以重金易之，藏之于沽水草堂。仅孙过庭《书谱》一件就花费三千金。沽水草堂藏品富宏，人称“海内之冠”。梅成栋称安麓村“倾家收藏项氏（项子京）、梁氏（清初收藏家梁蕉林）、卞氏（清代收藏家卞永誉）印珍”。因此，沽水草堂“宋元墨妙贮千帧”是毫不夸张的。

梅成栋还说安麓村有“鉴赏古迹不爽毫发”的本领（据《津门诗钞》）。那么安麓村是如何练就此等本领的？他自称：“余本性迂疏，志居澹泊，自髫年以来，凡人生所爱好者，如声色之玩，琴瑟之技，皆无所取，惟嗜古今书画名迹以自娱。每至把玩，如逢至契，终日不倦，几忘餐饮……迨后目力日进。”（《墨缘汇观·叙》）可见安麓村是以发愤忘食的毅力才获得了鉴别真伪的本领，以亲见多闻练就了一双慧眼。凡经他鉴定的书画大都准确可靠，他的一生为文物的去伪存真作出巨大贡献。

安麓村拥古今书画名迹，亦喜搜罗古籍典籍。其沽水草堂多藏善本，并出资刻印书籍名帖。他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得唐代孙过庭《书谱》墨迹后，为嘉惠后学，决定出资刊刻。问世后，引起书法界的强烈反响且惠及后学。当代书法大家启功先生谈到《书谱》时曾说：“清安麓村墨迹本精良，当墨迹印未流布时，此拓最称善本。”（孙过庭《书谱》考）

及至晚年，安麓村购藏名迹仍不遗余力。清乾隆九年（1744）重阳节前五日，年过六旬的安麓村久病在床，忽听有人携带三国时期曹魏书法家钟繇的《荐季直表》卷求售，竟离床而起，喜不自持。再三品鉴，认为“无疑为真迹”，遂不惜重金收购，并慨然写道：“何幸衰余年，复能得以墨妙，事属奇甚，岂非与翰墨有缘耶？”

安麓村编撰有一部书画著录，名曰《墨缘汇观》。该书无论是著录的丰富、鉴赏的精湛，还是编排的得体上，均达到清代最高水平。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著录书法，下卷著录名画，并记叙纸绢、作品内容，间作考订，海内精鉴者莫不贊